新史學二十九卷二期
二〇一八年　六月

依違於江湖與廟堂之間——明清之際保標行跡考

陳熙遠*

過去關於保標與標局的研究，多以稗官野史的記載為憑。殆以正史闕如，諱莫如深。本文嘗試以檔案文書為主，探討明清之際保標活動的蛛絲馬跡。軍力不足一直是晚明邊防的隱憂，如何招募江湖草澤之士，並將之整編為效命廟堂征戰疆場之兵，成為朝廷應對遼東邊關戰火的當務之急。本文利用庋藏於史語所內閣大庫的明代檔案，並對照相關疏議，指證當時山東臨清的保標武力開始受到重視。保標的發祥與臨清有深厚的地緣關係。臨清位居京杭大運河的樞紐，為水陸兩路的交通要衝，商貿鼎盛，北方京省對南方標布的大量需求，更對保標活動的專業化發展推波助瀾。對比明代小說《金瓶梅》所載，可佐證該書所虛擬的「清河縣」，當以成書之際——明代中晚期的臨清州為臨摹的藍本。當時臨清乃為天下的水馬頭，商旅輻輳、標客雲集，儘管《金瓶梅》成書之際，西門慶經營的標船，尚未有運用武力護衛的描述，但逮至萬曆晚年，臨清保標的武力，儼然已聲聞京師。護送標商的民間武力在晚明危急存亡之秋，成為廟堂招募江湖的兵源之一。迨至清朝國力中衰以後，軍事防禦兵力需求正殷，保標亦曾一度被視為可供收編的應急戰力。行走江湖的標客，再度搖身變為效命廟堂的標兵。只不過這批臨時被國家收編的民間武力，平常或許可以弭平江湖上的小風小浪於一時一地，但終究無法扶正將傾的廟堂大廈，挽回既倒的歷史狂瀾。

關鍵詞：保標(鏢、鑣)、臨清、標兵、廟堂、江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保標——外傳與正史之間[1]

目前市面上已有不少關於標局的通論性作品，[2]儘管將標局的組織與發展描寫得繪聲繪影、煞有介事，然畢竟實據無憑，能否反映歷史實情，難免令人疑信相參。特別關於保標活動起源的時代背景與地緣關係，多屬臆測揣想，且人言言殊。

史學界運用傳統意義上的史料探討保標與標局的可能起源，多始自經濟史的研究大家。出身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衛聚賢(1899-1989)，在其關於山西票號史的開創性研究裡號稱，經過考證，原來顧炎武(1613-1682)、傅山(1607-1684)與戴廷栻(1618-1691)等清初遺民為了推翻清朝，利用山西人長於經商，創設「標局」，以雇用武人保護商人或幫商人轉運現金為名，暗地進行革命事業。[3]衛聚賢《山西票號史》的初稿寫成

1 由於「保標」、「標局」應為原生本義，「鏢」、「鏢」等字則為後出，因此本文率以保標、標局行文。惟涉及引文處，悉依原著措辭。

2 例如：曲彥斌，《中國鏢行》；方彪，《鏢行述史》(按：該書後又改以《京城鏢行》發行)；李金龍、劉映海，《清代鏢局與山西武術》。真正運用的歷史文獻相當有限，曲彥斌在《中國鏢行》末頁僅列出十種「主要參考文獻」(頁 172)，其中前四種屬原始材料，除了徐珂《清稗類鈔》之外，一是曾任標師的李堯臣(1876-1973)口述史料：李堯臣，〈保鏢生活〉，頁 229-246；一是〈江湖走鏢隱語行話譜〉，收入曲彥斌點校，《中國民間隱語行話》，附錄；最後就是劇作名家齊如山(1875-1962)以筆記形式所寫的〈鑣局子史話〉，收入齊如山，〈鑣局子史話〉，《齊如山隨筆》，頁 69-74。

3 衛聚賢認為票號的出現就是為了抵制標局的高額運費。至於標局確切設立的時代，衛聚賢在書中先是引萬籟聲《武術滙宗》：「考創設標局之鼻祖，係清乾隆時，神力達摩王之老師，山西人神拳無敵張黑五者，請于達摩王，轉奏乾隆，領聖旨，開設興隆標局于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嗣由其子懷玉、繼以走鏢，是為鏢局之縞矢。故鏢師父走鏢時，有『黑五』口號者，即看對方是否為張黑五門下之友朋孫徒也。」但他隨即批評說：「按戴廷栻卒于康熙三十年，標局之成立，當不在乾隆時代。」見衛聚賢，《山

於 1939 年，先是在《中央銀行經濟月刊》上發表，後因抗戰，遂先刊行初稿，後雖經數次重印，但並未再修訂補充。該書影響所及，山西儼然成為標局發祥之地。[4]

日本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領袖加藤繁(1880-1946)，晚年曾寫過一篇〈標局〉的短文。[5]除了藉由對北京會友標局(於 1922 年歇業)的考察訪談，描寫標局的經營，更引用錢肇鼇(1729-?)《質直談耳》中一位標客的故事：該標客從蘇州閶門搭船，護送兩箱「白鏹」(白銀)回嘉定，途中曾「手提雙刀」，在岸邊「伏于荒塚」，巧妙躲過三艘劫盜的危機。[6]約

西票號》，〈序〉，頁 1；〈歷史・票號的前身〉，頁 5-8。令人不解的是，筆者覆查萬籟聲《武術滙宗》一書，皆未見前項引文。參較：萬籟聲，《武術匯宗》，下篇，〈餘談・鑣師與江湖〉，頁 252-260。按：衛聚賢，本籍為山西萬泉，一生極富傳奇色彩，他自學出身，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曾親炙梁啟超(1873-1929)與王國維(1877-1927)等多位大家，後以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名世。他早年參與並主持南京明故宮遺址以及新石器文化的考掘工作，對中國考古學的早期開展有一定的貢獻，然卻似因種種緣故，竟至淹沒無聞。或因衛氏常持異論別解，多有待考或商榷之處，故未能被學界廣泛接受，然其立論仍有值得參考之處，非一般陳說襲見可比。在其自行重刊的《山西票號》書末，曾附上〈衛大法師(自警)語〉，頗堪玩味：「處處留心皆學問，事事如意非丈夫」、「研究學問主張『傳統』，傳統是『懶惰』的代名詞」、「我能寫時不寫，是我對不起國家；寫下稿子不能出版，這是國家的損失。」見衛聚賢，《山西票號》，〈衛大法師(自警)語〉，頁 356。

4 今山西平遙並設有「華北第一鏢局」博物館。沿用乾隆年間山西人神拳張黑五創辦興隆鏢局的說法。參見其官方網站：http://www.hbdybj.com/index.htm, 擷取日期：2018 年 8 月 26 日。

5 加藤繁，〈標局〉，頁 127-132。

6 原文見錢肇鼇，《質直談耳》，卷 2，〈帛[布]標客〉，頁 2b-3a。按：傅圖藏本為六卷本，應為 1914 年新鐫本，前有錢大昕於乾隆五十年[1785]之序文。錢肇鼇為乾嘉考證大家錢大昕(1728-1804)之弟，「精於六書形聲之學」。另加藤繁在引文中，將「伏于荒塚」誤植為「伏手荒塚」。見加藤繁，〈標局〉，頁 131。

略同時，明清經濟史名家傅衣凌(1911-1988)也留意到「保標」的「標」字本義，在〈明代陝西商人〉一文的註腳裡，傅氏援引褚華(1758-1804)於《滬城備考》中追記其五世從祖的一位僕人姚大漢「嘗為布商護貨，往來秦晉間，盜不敢近」，進而推測「清代的標客即源自標布客商，而標局則為護送布商而得名」。[7]陳國棟則於 1984 年發表〈保標考〉一文，參較多種史料進行更為細緻的考證，「保標」一詞的本源，以及其與護送標布客商的密切關係，自此可謂定讞。[8]

關於保標活動與標局設置的情節，殆始見於清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的話本小說，例如出身滿洲鑲紅旗的「燕北閑人」文康所創作的《兒女英雄傳》(《金玉緣》)。另有不少作者佚名的公案小說，以歷史人物為依託敷衍故事，關於江湖保標的情節更數見不鮮，最著名的有以施琅(1621-1696)之子施世綸(1659-1722;書中作「施仕倫」)為主角的《施公案》、以彭定求(1645-1719)為核心的《彭公案》。不過這些小說設定的背景既在康熙(1661-1722)、雍正(1722-1735)年間，出現江湖走標的活動，倒也在情理之間。至於以明代中葉「海青天」海瑞(1514-1587)為名的演義——《海公小紅袍全傳》裡，有一回提及嬰山大王沈勇打劫「荊襄標商仝欽差學政」等同行的十餘號舡隻。沈勇當然早已「久聞標商多是有手段的」，而他底下眾頭目們也怯怯懦懦地提醒大王：

> 那舡上兵將手執軍器，甚至強勇，更有標客相幫，利害難當，不可惹他。

7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 201。按：據〈傅衣凌自傳〉，傅先生於 1946 年返回家鄉福州，擔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展開一系列商人與商業資本的研究，包括徽州商人、江蘇洞庭商人、陝西商人與福建海商，集結而成《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原由人民出版社刊行於 1956 年。參見傅衣凌，〈傅衣凌自傳〉，頁 127-136。另，其所引用〈姚大漢〉一條原文，見褚華，《滬城備考》，卷 6，〈姚大漢〉，頁 6。

8 陳國棟，〈保標考〉，頁 30-39。

但嬰山大王仍執意劫掠這一隊官商合舡，果見那位「護標好漢」以其「煉(練)就百發百中的神箭」，不僅隨手射死了十餘人，更對著登上船頭的沈勇，袍袖一起，將一枝箭「搜地一聲正中其咽喉」。[9]如果小說裡這段虛構的情節可以當作屬實的本事，那麼這段傳奇無疑是江湖保標首度與廟堂官兵聯手禦敵的歷史美談。

逮至民國以後，關於江湖的俠情演義可謂是變本加厲，越「演」越烈，標局在近現代武俠小說裡幾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舉凡武俠小說裡，各種幫、派、教、會之外，最常見的兩種建置無非是客棧與標局：客棧是往來武林中敷衍是非的公共場域，而標局則是行走江湖招惹恩怨的民間組織。沒有客棧、標局，武林江湖何來恩怨是非？！

即以當代家喻戶曉的金庸(查良鏞)的作品為例，其小說常將虛構的英雄傳奇與史傳的人物事件參融互動。在其以清朝為背景的小說裡，幾乎皆有鏢局的蹤影。[10]而在其全部作品裡，最早出現鏢局的時代是歷史背

9 佚名，《大明繡像小紅袍全傳》，14 回，〈兩欽差解寶遇劫，嬰山盜拯溺反讎〉、15 回，〈孫娘子山寨解難，沈大王江畔捐軀〉，頁 16b-20a。按：小說中「荊襄標商」有時亦作「荊襄布商」，此亦可證「標」、「布」兩字互義相通。此外《古本小說集成》本中在其出版說明的「前言」中，將原出版年「道光壬辰」誤判為「道光十一年(壬辰，1882)」(頁 2)。又：在其前傳《海公大紅袍全傳》裡，雖曾出現「保鏢」一詞，但僅是比喻的用法，意指嚴世蕃在朝中有父親嚴嵩和內監王惇的庇蔭：「我父在朝權秉鈞衡，在皇上跟前，言必聽，計必從。我又同王內監情同骨肉一般，即有什麼彌天大禍，有此二人保鏢，還怕什麼大事！……」嚴世蕃意指他在朝中有父親嚴嵩和內監王惇庇蔭。見佚名，《海公案》，51 回，〈小嚴賊行計盜孌童〉，頁 300。按：本文所有引文劃底線處皆為筆者所加，以為提點之用。

10 其首部創作《書劍恩仇錄》(1955)，故事展開於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裡面出現北京的鎮遠鏢局。隨後以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780 年 4 月 19 日)的《雪山飛狐》(1959)則有北京的平通鏢局，作為《雪山飛狐》前傳，並與《書劍恩仇錄》有所聯繫的《飛狐外傳》(1960)，則除了鎮遠鏢局外，還有飛馬鏢局、延安府的五郎鏢局與大同府的興隆鏢局。《碧血劍》(1956)的

景設定於宋元明之交的《倚天屠龍記》，不過恐怕並不符合保標興起的歷史實情。該書的故事主軸從第三章正式展開，金庸明白標定時值元順帝至元二年三月廿四日(1336年5月5日)，武當三俠俞岱巖無意間獲得「武林至尊」的屠龍刀，但在攜返武當山的途中，遭到天鷹教紫薇堂堂主殷素素的暗算，屠龍刀不幸被奪。而不願與武當正面結怨的殷素素，暗地以二千兩銀委託臨安府的「龍門鏢局」，將身受重傷的俞岱巖運回武當山。此外書中還陸續出現虎踞、晉陽與燕雲等名號的鏢局。金庸信手拈來，一舉就將標局出現江湖的時間，往前推移了將近三百年。

《笑傲江湖》是少數被作者刻意隱去歷史背景的作品，故事裡當然也出現了福建的福威鏢局。儘管金庸並未明白標示《笑傲江湖》的年代，但有考證癖的讀者，仍可從建置或情節所涉及的蛛絲馬跡中試作推敲。其中該書有一段是「天王老子」向問天拿出一幅圖為賭注，引誘梅莊四莊主丹青生打賭。書中描寫向問天打開一個卷軸，圖畫上「一座高山沖天而起，墨韻凝厚，氣勢雄峻之極」，而在那陳舊的圖畫右上角題著「北宋范中立谿山行旅圖」十字。[11]其實這詩塘上的題字出自晚明書畫名家董其昌(1555-1636)的手筆，並鈐有「宗伯學士」、「董其昌印」等印記。而這幅北宋畫家范寬(字中立，990-1020)著名的「谿山行旅圖」後來庋藏在乾隆皇帝(1711-1799, 1736-1795在位)肇祥之地——

故事從明崇禎六年(1633)一路鋪陳至清順治元年(1644)，其中有武會鏢局、永勝鏢局和廣武鏢局。而金庸封筆之作，是以康熙初年莊廷鑨(1585-1655)明史案揭開序幕的《鹿鼎記》(1969)，自然在北京也有武勝鏢局。以上例舉皆參見「遠流版」金庸小說全集。為省篇幅，恕不一一羅列出處。書後年代為初版之時。此外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短篇小說《白馬嘯西風》(1961)有山西省太谷縣晉威鏢局，《鴛鴦刀》(1961)裡則有陝西西安府威信鏢局，《俠客行》(1965)裡有渝州的西蜀鏢局。據筆者初步估計，金庸15部小說中殆出現過18所鏢局。

11 金庸，《笑傲江湖》，19章，〈打賭〉，頁777-816。

重華宮裡，並編入乾隆九年(1744)開始纂集的《石渠寶笈》。[12]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原畫詩塘正中央還有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的璽印。若以此蒐藏的線索推敲：《笑傲江湖》所描述的時代背景，應該就是這幅畫從晚明董其昌題款註記之後，到乾隆皇帝御覽鈐印之前；亦即從流落於江湖到收編入廟堂之間。[13]有趣的是：金庸刻意隱去時代背景的這部小說，反倒符合本文推估歷史上標局出現的時間點。[14]

當然，文學藝術的創作，本有權無視於歷史框架的羈絡。反言之，歷史學家在運用戲曲小說時，就必須審慎對待。例如 1969 年張徹導演、倪匡編劇的「保鏢」，甚至將故事背景設定於北宋年間，以洛陽「無敵莊」為官府押解 20 萬兩黃金前往開封，中途遭遇「飛虎寨」盜寇埋伏劫掠，三位兒女英雄聯手抗敵護鏢的過程來鋪陳情節。[15]當然這並不意味距離歷史越遠的文學創作，就越容易罔顧歷史實情。初版於乾、嘉之際的《粉粧樓》，故事乃延續《說唐後傳》，描寫唐代開國功臣之後聯合忠義之士懲惡鋤奸的故事，其中也有一回如此描寫：

> 眾位英雄上了馬頭，戴煙氈大帽，身穿元色夾襖，身帶弓箭腰刀，扮做標客的模樣，沖州撞府，只奔山東大路，投雞爪山去了。[16]

12 張照，《石渠寶笈》，卷 26，〈重華宮七〉，頁 25。

13 當然，仿范寬此幅畫作的名家極夥。董其昌之外，孔尚任(1648-1718)在〈題方一峰摩范寬行旅圖〉一詩，也曾表示：「吾圖已鬻此圖存」。見孔尚任著，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冊 3，頁 1460-1461。

14 當然，小說虛構，本可存於無何有之鄉。書中有些地名的舛誤，不宜吹毛求疵。如該書中第 30 章提及「黑木崖是在河北境內，由恒山而東，不一日到了平定州。」實則平定州位於山西省，至於河北一地，明清兩代皆屬直隸省，民國十七年(1928)以後方改名為河北省。

15 張徹導演，倪匡編劇，「保鏢」(Have Sword, Will Travel)。主要演員有姜大衛、狄龍與李菁。

16 作者原可能只是用「標客」的模樣，讓讀者領略這些人的扮相。見竹溪山人撰，《粉粧樓》，56 回，〈老巡按中途遲令箭．小孟嘗半路贈行裝〉，頁 39b。

儘管《粉粧樓》裡並無標局、標行或保標的蹤影，但推敲這段描繪，似乎早在大唐盛世之際就已出現「標客」的職業，而且其裝束模樣已成為一種套式，深烙人心，因此假扮者得以依樣模仿，而旁觀者則可以從其裝扮辨識指認。儘管小說演義裡的武林，自有一套紀事繫年的時空座標，然而不論如何，就《粉粧樓》這節的描繪，對應的恐非唐朝的實況，更可能是反映作者所處乾嘉之際的情境：「標客」的職業身分、裝扮造型，已成慣聞習見。

小說稗史裡對出入江湖的保標情節，儘管描繪具象且鮮活，但畢竟多為文學想像的投射，不宜直接作為考證歷史實情的憑據。本文試圖以檔案文書作為主要的論證依據，耙梳出其中關於保標活動早期發展的蛛絲馬跡。當然筆者並未忽略：號稱存真的官書檔案未必呈顯遭到壓抑的實情，而可能受囿於書寫者的視野產生遮蔽的盲點；虛構的小說稗史也未必純屬橫空出世，有時反而更能照映出正史所忽略的故事曲折。但如果我們先從官方文書檔案入手，也許別有發現：江湖上行走的保標，其實不只存在於江湖上的演義傳說而已。

二、備戰遼東——晚明東北潰防與江湖募兵

就目前筆者所蒐集的史料而論，涉及「保標」最早也最重要的史料，實則攸關大明朝廷因應東北女真勢力的崛起。

顧名思義，「遼東」(遼左)一詞殆指遼河以東的區域。不過在中國歷史上，它所指涉的範圍，並不侷限於渤海與黃海之間的半島，還包括現今東北亞的泰半腹地。明永樂(1402-1424)至宣德(1425-1435)年間，還曾一度在遼東半島以北設置奴兒干都司(1409-1434)，管轄範圍包括黑龍江、烏蘇里江與松花江流域。而在行政體系上，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同屬於山東承宣布政使司的轄區。

在明國四境邊防之中，西北的蒙古與嘉靖以後東南的倭亂，向為朝廷邊防的重點。相較之下，東北女直(真)的威脅相對隱晦。儘管李夢陽(1472-1529)早在其〈秋懷〉詩裡便曾經預警：

> 大同宣府羽書同，莫道居庸設險功。安得昔時白馬將，橫行早破黑山戎。
>
> 書生誤國空談裏，祿食驚心旅病中。女直外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遼東。[17]

就命題與形式來看，李夢陽創作這〈秋懷〉八首，透過地景或史事興起抒懷，顯然有意追步唐代杜甫(712-770)寫於大曆元年(766)的〈秋興〉八首。不論如何，李夢陽「急將兵馬備遼東」的呼籲，在其寫作當時畢竟是空谷跫音，並未獲得任何重視。直到晚明女真坐大，遼東局勢一發不可收拾之際，識者方才恍然：當年李夢陽並非杞人憂天的囈語，詩句竟成讖語。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在呈請朝廷因應「滅虜安邊」當發帑金以佐軍興的題本裡，特別標舉出李夢陽該詩所言確有先見之明。[18]後來廣東博羅的張萱(1553?-1636)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罷官歸里後，積二十餘年的苦心孤詣，輯成 107 卷《西園聞見録》，整飭自洪武(1368-1398)以迄萬曆(1572-1620)時期的國朝史事，全書檢視兵事者高達 32 卷，無疑是其措意關注的重點。張萱在檢視遼東局勢的發展時，也特別提及：「李公夢陽〈秋興〉

17 李夢陽，《空同集》，卷 29，〈秋懷．其六〉，頁 3b-4a。從《空同集》詩集編排的順序推敲，李夢陽的〈秋懷〉詩應寫於正德六年(1511)之前，卷 28 為五言律，而卷 29 為七言律，〈秋懷〉詩之前的作品無年代的線索，而其後則有〈正德辛未(1511)四月十七日簡書始至於時久旱甘澍隨獲漫爾寫興〉，以及〈春暮丁丑(1517)年作〉、〈戊寅(1518)早春上方寺〉等詩。

18 程開祜，《籌遼碩畫》，卷 16，〈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聖諭軫念遼左周至，滅虜安邊有機，伏乞大發帑金以佐軍興、以鼓士氣事〉，頁 52b。

詩有和戎劇戎，急備遼東之語，不幸而中矣！」[19]

在李夢陽寫就〈秋懷〉詩的一百多年之後，出身建州左衛的努爾哈赤(nurgaci, 1559-1626；天命，1616-1626)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在赫圖阿拉(hetu ala)稱汗，成立了後金汗國(amaga aisin gurun, 1616-1636)。兩年之後，努爾哈赤更大張旗鼓，羅列明國「欺凌至極，實難容忍」的「七大恨」告天誓師，正式與明朝決裂。[20]等到努爾哈赤軍隊勢如破竹地連陷撫順、清河等軍事據點，明國朝廷才意識到事態極為嚴峻，於是在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大舉動員，幾傾全國的正規兵力，以曾奉命經略朝鮮軍務的兵部侍郎楊鎬(?-1629)總督大軍，擬以四路兵馬分進合擊，欲對後金部隊施以致命的夾擊。不料努爾哈赤早已掌握到相關情報，並採取「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策略，在薩爾滸(Sarhū)一役，徹底擊潰明軍。[21]大明與後金兩國國力頓時此消彼長，雙方對峙的攻防情勢自此易位。

萬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探花張瑞圖(1570-1644)曾有詩句：「昨聞遼東失鼙鼓，江湖中宵汩如雨。何人借箸能籌邊？誰信賦詩堪退虜！」[22]當時明朝諸臣應該不至於妄想以賦詩退敵，[23]但就在遼東災報踵至，遼左事勢岌岌之際，卻有不少朝臣士子「會聞遼警，喪師蹙

19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 53，兵部二，〈附己未西園聞遼警詩小序〉，頁 14b。張萱將李夢陽原詩題〈秋懷〉誤記作〈秋興〉，倒也反映他洞悉李夢陽追步杜甫詩作的用意。

20 努爾哈赤所宣稱的「七大恨」，詳見清高宗敕纂，《清實錄．滿洲實錄》，卷 4，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頁 198b-207a。

21 詳細經過，參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 1，〈遼左兵端〉，頁 1a-15b。

22 張瑞圖，《白毫菴》，祼篇，卷 1，〈答賴王言〉，頁 100。

23 按：典出北宋大將高瓊(935-1006)在澶淵之役(1004)時，反諷文臣馮拯(958-1023)「何不賦一詩以退敵」的故事。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8，真宗丙子，頁 18-19。

地，患且剝膚」。[24]因此紛紛效法漢朝開國功臣留侯張良(?-185 B.C.)「借箸代籌」的典故，提出各種籌邊退虜的因應策略。而禦遼抗金之道，除攻防戰略之外，不外乎兵源與軍餉兩項。誠如劉錦藻(1862-1934)所論，明朝自中葉以後，「天下衛所之兵幾於徒有虛籍，緩急所恃，惟民兵及諸鄉兵，與四川、粵西、湖廣三省之土兵而已」。[25]一旦邊防吃緊，如何擴大招募江湖草野之士，加以整頓訓練，以為朝廷效命，遂成當務之急。

當時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1561-1635)眼見遼左喪師之後，朝中「凡議兵、議餉等項，章滿公車」，而他特別針對募兵練兵避免虛冒一事提出建言。當時朝廷在研議召募新兵之來源時，主要傾向從中州河南、山東、浙江與直隸等處著手。盧謙特別提醒朝廷應該向山東東昌府的臨清一地招募武林好漢：

> 職謂山東之中尚遺東昌之臨清。蓋臨清以護送標客爲生業，其習于武事，無人不然。職素遊齊、魯，聞之有日。舊秋詢之撫臣李長庚，亦言招兵無如臨清，則臨清亦當多募也。[26]

盧謙為南直隸盧江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進士，曾任江西永豐縣知縣。他以在山東地區的親歷見聞作證，並引山東巡撫李長庚(?-1644)的建言為奧援。李長庚是湖廣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任江西左右布政使，四十四年陞任山東巡撫。[27]萬曆四十六年(1618)，當遼左孤危已極，李長庚緊急題奏，表示登州水陸二營共額兵

24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卷 3，〈擬上救時萬言書〉，頁 1a。

25 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續文獻通考》，卷 128，〈鄉兵〉，頁 56。

26 程開祜，《籌遼碩畫》，卷 20，〈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為遼左事勢岌岌，謹效愚悃，以備採擇、以保封疆事〉，頁 26a。

27 顧秉謙等纂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實錄》，卷 542，萬曆四十四年二月丙寅[25]日，頁 10307。

2,419 名，奉旨從中挑選 1,500 名渡海赴遼應援，所存只九百餘名皆為「挑選遺剩者」，何況登州「孤懸三面，備禦全空。一水之外，南有倭、東有虜，萬一交警，則束手坐困，無可支撐」，因此建請「一面發兵、一面召募」，望能募補到千名新兵，以保內地無虞。[28]雖然李長庚並未在該題奏中提及要特別向何處招募兵源，但對照盧謙題奏中援引兩人面晤時的商議，顯然兩人都對招募山東臨清一地的民間武力以為「檢兵練卒」，抱持高度的期待。山東與遼東本屬同一轄區，唇齒相依，若能在山東本地召募援兵，當可儘速揀練，並及時馳援，可說是就近汲水救火，實為備禦之上策。盧謙以其親身所見，加上山東巡撫的附議，建議朝廷應在山東東昌府的臨清州廣招兵馬，因為該地素以「護送標客為生業」，並以習武為尚。過去研究保標的學者惜從未留意盧謙這份題奏，這份奏議至為重要，足以確認：臨清的保標活動，最遲在萬曆中後期已然極為活絡，而且當時當地以保標為生業的人口，必然達到一定的數量，才可能成為朝臣在研擬招募兵源時的一個選項。

事實上並非僅有盧謙倡議召募臨清的標兵，當朝廷陸續從直隸、山東、河南、山西與陝西等處各州縣分別召募 40 名兵入衛之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牟志夔曾針對如何擴大召募各地驍勇提出建言，其中亦特別舉出：

> 有兵之處，以所募之兵應。如河南之毛兵、少林寺之僧兵、山東臨清之獲(護)送標兵之類，并他州縣驍勇應募者。夫不强之，以不就于行間，約束猶易。[29]

28 顧秉謙等纂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實錄》，卷 569，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癸酉[十五]日，頁 10717。

29 程開祜，《籌遼碩畫》，卷 25，〈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牟志夔題為海內援兵漸集，遼左制勝有機，謹陳一得，以佐朝議，仰祈聖斷事〉，頁 50b-51a。按：原文作「獲送」，應即「護送」。另，牟志夔為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

為了因應國家兵員的嚴重不足，除了在京省左近州縣招募兵丁之外，也特別徵召特殊的民間武力，包括河南的毛兵、嵩山少林寺的僧兵，以及山東臨清的標兵。其中河南的「毛兵」，指的應是毛葫蘆兵。按照自幼潛研武學的程宗猷(1561-?)的解釋，「毛葫蘆」原指這群人取鹿之陰囊外皮包裹箭筒，防止竹筒因風而裂。[30]而河南南陽、鄧州等處的毛葫蘆軍，早在元末就曾被官府收編。[31]至於朝廷借用少林僧兵的歷史則可上溯至唐代，而明代嘉靖年間在因應倭寇對東南海疆的劫掠侵擾等時，朝廷更多番仰仗少林僧兵的武力。[32]

必須留意的是：此處所指的臨清標兵，顯然不是明中葉之後開始設置的標兵。抗倭名將戚繼光(1528-1588)曾在〈辨請兵〉一文中解釋：「標兵，乃就中掄各部曲之壯者，不滿數千，隸于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33]這些標兵其實是直接隸屬於總督、

生卒年待考，現存史籍多載其為閹璫魏忠賢(1568-1627)黨羽，並刻意稽延崇禎帝登極後赦還東林名臣趙南星(1550-1627)之詔令，以致趙死於戍所。參見溫體仁等奉敕修，《明熹宗實錄．附錄》，天啟七年十月庚戌[十七]日，「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趙南星卒」條下小註，頁 18-19。並見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43，〈趙南星〉，頁 6301。

30 程宗猷在《蹶張心法》一書裡敘及弩箭竹筒的製法時，順帶提及「毛葫蘆」一詞的由來：「箭筒以竹為之，兩頭存節，取節比箭略長一寸中間近上開一門，門之長短以箭出入無礙為率。竹見風多裂破，故毛葫蘆兵射鹿，取鹿陰囊皮上下包裹，見風不裂。稱毛葫蘆兵者以此。」程宗猷，《蹶張心法》，卷 1，〈造弩箭筒說〉，頁 12b-13a。

31 《元史》描寫這些「金、商義兵」「以獸皮為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宋濂等撰，《元史》，卷 139，〈朵爾直班〉，頁 3359。

32 關於少林寺捍衛朝廷的傳統，可參考 Meir Shahar, *The Shaolin Monastery: History,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55-81.

33 戚繼光，〈辨請兵〉，收入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戚少保文集》，卷 349，頁 3753a。按：該文作於隆慶二年(1568)三月，見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請兵辨論〉，頁 7b-14a。

巡撫或總兵轄下的親信部隊。[34]而此處臨清的標兵，即指招募原本從事護送標客行業者充軍為兵。與少林僧兵或河南毛兵的差別是：這群保標之徒是在明代後期才新興形成的江湖勢力。可惜臨清標客在史書裡獲得的關注，遠不如其他投效過廟堂的江湖武力，後者如少林僧兵至少為清朝官方欽定的《明史》所收錄，歸類在「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旅緩急」的「鄉兵」中。[35]臨清標客的蹤跡則幾乎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

從牟志夔奏議的措辭推敲：河南的毛葫蘆兵、嵩山少林寺的僧人、臨清的保標，或者是充滿地域色彩的特殊族群(毛葫蘆兵)、或者隸屬於某一宗教組織教徒(少林僧)、或者是具有特定職能的行業身分(保標)。凡此皆具有可供外人指認、而與他者足以區分辨別的社會身分，並且有強烈的地緣關係。而且上自廟堂，下至江湖，人人可能都已習聞曉喻，因此向朝廷建言的上奏者無庸添附註解，說明這些可供招募的兵源為何，而覽奏的天子或部議的諸臣也都知其所指為何。換言之，臨清的保標雖是新興的民間武力，但在當時已經是一種具有辨識性的職業身分。可以推測：這群提供武力來保護標商跋涉遠途的標兵，極可能是經過長期經營之下，透過一定的社會組織或區域網絡來聯繫、動員，甚至平常進行演習訓練的武力社群。

三、天下咽喉——臨清標客與保標武力的發祥

若非有一定數量，大臣在題奏建議中不可能單獨點名山東臨清一地。換言之，臨清一地在萬曆年間勢必已然聚集相當人數的標客。問題是：為甚麼山東的臨清竟會聚集數量如此大的保標武力？

34 關於明代標兵的起源與發展，參見蕭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
35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91，〈兵志・鄉兵〉，頁 2251-2252。

修纂於萬曆年間的《歙志》，曾如此羅列當時各個行政層級的「都會」區：

> 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36]

其中州一級的「都會」——臨清與濟寧兩州皆在山東，皆可說是應「運」而生，即因位於京杭大運河的交通要津而滋盛繁衍。京杭大運河自元代開通以後，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經直隸、山東、江蘇和浙江諸省，並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37]其中臨清因位於京杭大運河與衛河的交匯之處，扼據要津，自明代中葉起已急遽發展為華北最繁華的商業城市，[38]向有「天下咽喉」之稱(圖 1)。[39]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的會元傅夏器(1509-1594)，亦如此盛稱臨清：「南北之襟喉，天下之都會。言繁華者莫先焉。」但他也預判：一旦「天下有變，則臨清必受兵」。而以當時臨清之富庶繁華，終難免「藏多則誨盜，物聚則興戎」；[40]承平之時可能為盜匪所覬覦，戰亂之際則

36 張濤修，謝陛纂，《(萬曆)歙志》，卷 10，〈貨殖二〉，頁 2a。

37 關於明清運河沿岸城市發展的綜述研究，參見傅崇蘭，《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關於大運河物產流通的動向與收取體制的發展，可參考川勝守，〈明代、長江・大運河水運の流通構造〉，頁 483-503。

38 參見許檀，〈商業城鎮的發展〉，頁 110-183。

39 楊洵、陸君弼等纂修，《(萬曆)揚州府志》，卷 17，〈名臣傳・曾銑〉，頁 30b。

40 傅夏器，《重刻叔祖錦泉先生文集》，卷 2，〈曾子館陶典史序〉，頁 31b。傅夏器該文主要是應同鄉曾龍湖選授治理館陶縣，提醒他館陶作為臨清州的旁邑，「天下有變，則臨清必受兵，兵禍中於臨清，則館陶亦不能以無事」。傅夏器所言不虛，後來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二日，清兵破臨清，隨即於二十六日圍攻館陶，因「城守甚固」，清兵暫時撤去。見趙知希纂修，張興宗增修，《(雍正)館陶縣志》，卷 12，〈兵警〉，頁 8。

更成為兵家必爭的資源寶庫。

即使經過明清更迭的巨變，臨清州仍能迅速從兵燹中恢復元氣，主要是因其位居要津的優越地理位置，而得以在短期之間重整旗鼓。雍正年間編定的《山東通志》如此賦詠臨清州：

> 連城依阜，百肆堵安。兩水交渠，千檣雲集。關察五方之客，牐通七省之漕。[41]

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乃由運河供億京師，而臨清州綰轂南北水陸咽喉，商貿活動自然極為發達。其中最重要的商品，無非江南所生產的棉布。晚明上海人張所望(1556-1635)便曾在《梧潯雜佩》自誇其家鄉松江一地所製作的棉布足以「衣被天下」。[42]相對而言，江南人民的生計，也往往仰給於賣至北方的標布。保標最初即以護送貿易到遠方的「標布」為生意。[43]陳國棟比較萬曆《清浦縣志》(萬曆廿五年，1597)與崇禎《松江府志》(崇禎三年，1630)關於朱家角描述的關鍵差異，前者僅作「商賈輳聚，貿易花布，爲今巨鎮」，後者則作「商賈湊聚，貿易

41 岳濬修，杜詔纂，《(雍正)山東通志》，卷 7，〈形勝志〉，頁 11a。

42 張所望同時指出，棉花之種原出西番，元朝始進入中國。該說為清代學者廣泛援引。見汪灝等編，《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12，〈桑麻譜・木棉花〉，頁 6b-7a；鄂爾泰編，《授時通考》，卷 77，〈桑餘・木棉辨〉，頁 22a；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 24，〈衣冠門・布〉，頁 23。

43 按：「標布」的用法一直沿用至清末，《(光緒)川沙廳志》曾介紹各種服用之布：「布，以棉花爲之，密而狹者爲『小布』，亦謂之『扣布』，又名『中機布』。幅略濶者爲『大布』，亦謂之『標布』。長十六尺爲『平梢』，二十尺爲『套段』。……」似乎是以尺幅大小劃分。見陳方瀛，《(光緒)川沙廳志》，卷 4，〈民賦志・物產〉，頁 15b-16a。若根據清代的裁衣尺，1 尺約 35.5 公分，因此平梢約為 568 公分，套段則為 710 公分。另外，王韜(1828-1897)在其《瀛壖雜志》裡描寫其鄉里女紅之紡織，則指出：「所織之布，則有小布、稀布，以丈尺之短長為別，其行遠者為『標布』。關、陝、齊、魯諸地設局邑中，廣收之，販諸北方。」王韜，《瀛壖雜志》，卷 2，頁 3。

花布，京省標客往來不絕。今爲巨鎮」，並就其中新增的關鍵之句推斷：標客往來不絕的現象，當出現在兩志修纂之間。[44]

明亡之後自縊殉節的徐石麒(1577-1645)即曾估計：江南人民的衣食之源，若以十分計之，則耕鑿佔十分之四，貿易佔十分之三，機杼佔十分之三。倘若一旦「標布不行」，將造成「工食騰湧」，影響所及，「緯霜織月之家，大抵操杼軸而泣矣！」[45]以節烈終生的浙江嘉善人陳龍正(1585-1645)也曾呼籲城居的鄉紳急公好義，在天荒年歉時不僅捐輸賑災，更可以粟米換購布匹的方式，救濟紡織農家一時之急。他認為等到「標客銀至，布價自然復增，頓主結賣，可仍得原初米價」。[46]由此可見江南棉織與北方標客間生計的依存關係，極為密切。

浙江山陰的祁彪佳(1602-1645)在其《宜焚稿》中，載存不少其經手審理的重大案件，其中一件是他在擔任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時，負責審理的一位標布商人謀害親弟，導致十條人命喪生的重大刑案。根據祁彪佳題本中描述該命案發生的過程，可以看出松江府與臨清州標布貿易的往來模式。整個案情相當曲折，主謀黃自富原在松江府開設「萬元字號」的布店，而事件的導火線則是在天啟六年(1626)八月，黃

44 陳國棟，〈保標考〉，頁 34。此外，顧炎武的《肇域志》也沿襲崇禎《松江府志》對松江府朱家角鎮的描述：「商賈輳聚，貿易花布，京省標客往來不絕。」顧炎武，《肇域志》，卷 9，〈松江府〉，頁 10a。

45 徐石麒，《可經堂集》，卷 10，〈答按臺宗凌霄，名教一〉，頁 38b。

46 原條文為：「吾邑以紡織爲業，婦人每織布一疋，持至城市易米以歸。荒年米貴則布愈賤，各賈乘農夫之急，閉門不收，雖有布，無可賣處。鄉村如有好義之家，量米多少隨附近收換布疋，每疋約照時價寬付米一升。積布在家，俟標客銀至，布價自然復增，頓主結賣，可仍得原初米價。此不過守候兩三月間，已[己]財不損分毫，而應農家之急，有莫大之功。鄉紳城居者可倣此意，各就附近城外懸牌收買，則粟、布互相流通，農夫餉婦不至束手枵腹矣。捐賑之外，設此權宜，以為惠而不費之計。」陳龍正，《幾亭外書》，卷 4，〈救饑法十五條．鄉村收布三〉，頁 49b-50a。

自富本將「萬元字號」的標布 1,200 筒，捲成 299 包，共計 12,000 疋，準備運往臨清，發賣給當地「南屏鳴玉」的店舖，每筒介付該銀 72 兩，付折色 7 兩 2 錢(九折)，再付朱行一兩二錢，因此找文 6 兩 6 錢。然而船行途中，在長洲縣沉湖十八家村一地，竟遭其弟黃自儒糾夥攔截，將其標布劫走，轉載至湖州典當。[47]

當然北方的標客可能定期到江南收購標布，然後再轉售北方各地。也可能如前案所示，松江府的布店與臨清州的舖號兩造間建立起貿易伙伴的契約關係。不論貿易的形式如何，位居水陸交通輻輳的臨清，都是江南標布轉運北方各省的樞紐重鎮。揣摩當時的情景：北方京省標客攜帶銀兩到江南地區蒐購標布，再運送到北方諸省販賣。來時攜帶標銀，去時載運標布，南北往來絡繹不絕，專業的保標自然應運而生。崇禎(1627-1644)初年擔任戶部尚書掌管全國財政的畢自嚴(1569-1638)曾針對兵餉急需提出權宜設法的建言。其中他特別針對標客布商遠程夾帶萬金諸多不便，建議朝廷可仿效會票的做法：

> 今道路險阻，商人如標客、布商之類，家挾萬金，常思遠寄，不能奮飛。誠及此時亟下一旨，俾入金，臣部即給與會銀勘劄，不拘南京、各布政司，惟商意之所嚮，註定地方，文到之日，地方官驗明勘劄，不許稽勒，亦即日照數給還。仍將勘劄轉呈撫、按題繳。[48]

根據畢自嚴的規劃，戶部以會銀勘箚的方式，省卻標客遠程運送標銀的風險。這種運作模式，或可視為清代票號或現代銀行匯兌的早期雛型，只不過是由官方來主導認證與擔保。畢自嚴顯然特別針對當時標

47 祁彪佳，《宜焚全稿》，卷 8，〈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謹題爲閱墻釀禍株殺九命事〉，頁 472-498。

48 畢自嚴，《度支奏議》，堂稿，卷 10，〈兵餉急需權宜設法疏〉，頁 51b-52a。崇禎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

客南北往返，常有經年輸運標銀的需求。可見在道險路阻或跋山涉水的情形下，標客必須採取防範的措施。尤其踰境跨區的風險，隨著地方執法對轄區秩序掌控的降低，各州縣交界的荒郊曠野，極可能有王法鞭長莫及之處。

當萬曆四十六年遼左情勢「孤危已極」，山東巡撫李長庚請朝廷允許急調附近南兵，水陸兩師並進，以保衛封疆。當然，所謂師行糧從，隨著援兵的調增，額外的兵餉如月行糧等勢需調撥，當時山東省自從大祲之後，民力竭困，該營春餉無從支給，司府的庫藏俱爲賑荒而搜括如洗。而山東向來主要稅銀收入有二：一是來自東嶽泰山的香稅；[49]二就是臨清州解部、解監的稅銀。泰山香稅往額每年五萬餘兩，但此時只有六、七千至萬金而已，纔足額數的十分之二。面臨「官如懸罄，民若反裘，別無一絲一毫可爲借用」的窘境，李長庚建議朝廷考量：

> 惟有臨清解部、解監稅銀，每年約共四萬兩，伏乞皇上軫念東方、遼左唇齒之邦，與他地不同，援發既不可遲，備禦又不可懈，俯將前銀暫留應解之數，聽職等酌量爲發兵援遼，及募兵守登[州]之用，庶兵行不匱，內地永安，而緩急亦有所恃矣。[50]

臨清解部、解監的稅銀，主要來自創置於明宣德四年(1429)的臨清運河鈔關。萬曆年間，臨清鈔關每年徵收船料商稅銀，往往居全國八大鈔關——崇文門、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滸墅關、北新關(杭州)、

49 關於泰山香稅的研究，日本學者早發其端，見澤田瑞穗，〈泰山香稅考〉，頁 547-561。隨後有不少學者相繼投入研究，如韓光輝，〈泰山香稅考〉，頁 189-197；成淑君，〈自是神人同愛國，歲輸百萬佐昇平——明代泰山碧霞靈應宮香客經濟初探〉，頁 38-41；蔡泰彬，〈泰山與太和山的香稅徵收、管理與運用〉，頁 127-179；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稅新考〉，頁 37-132。

50 程開祜，《籌遼碩畫》，卷 4，頁 41a。

九江——之首。萬曆三十三年(1605)曾諭令戶、工二部：「其各省直稅課，俱著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并土產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之用。」[51]亦即一半解送內庫，一半解送相關部會，若有餘裕才提供京師與邊鎮之用。李長庚顯然不僅有意動員臨清的保標武力，同時也盤算著用臨清原本解送中央的稅收，以支用發兵援遼與召募新兵的軍餉。

臨清關不僅有徵收高額的稅銀，更隨著標布生意的發達，滋生豢養出一群行走江湖、隨機應變、閱歷豐富的民間武力。換言之，臨清一地蘊含的豐富「人力」與「財力」，儼然成為晚明抵抗清軍的重要後勤支柱。

過去可能受限於史料的蒐集不易，關於保標早期的活動，多從筆記小說的記載裡試加推敲。而溯源保標最早的線索，大抵追蹤到小說《金瓶梅》裡西門慶大官人所經營的「標船」。[52]本文則先從官方檔案的記載，確定了萬曆晚期臨清保標活動的熱絡，再回過來檢視《金瓶梅》裡的相關記載。《金瓶梅》在萬曆末葉於文人間廣為流傳，「公安三袁」中的老二袁宏道(1568-1610)曾將《水滸傳》、《金瓶梅》兩書並列為傳奇中的「逸典」，認為「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53]儼然推崇為品酒稱觴之輩必讀的經典作品。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1570-1623)先前曾聽過董其昌推薦：「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但董其昌又道貌岸然地表示「决當焚之」。後來袁中道藉探訪名山勝水以「滌

51 顧秉謙等纂修，《明神宗實錄》，卷 416，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寅[二]日，頁 7814。

52 最早注意《金瓶梅》裡「標船」的記載，是柴田忠雄於昭和十年(1935)於北京研究《金瓶梅》時所發現，後為加藤繁特加援引，認為此即明代中葉存在標局之證。見加藤繁，〈標局〉，頁 127-132。

53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 14，〈觴政・十之掌故〉，頁 5b。

浣俗腸」的雲游過程中，終在其二哥之處獲見這部「模寫兒女情態具備」的小說。他在萬曆四十二(1614)年七月的日記裡表示：《金瓶梅》儘管有誨淫之虞，既不必焚毀，也無需崇奉，「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54]而李日華(1565-1635)是在萬曆四十三年(1715)十一月五日獲讀朋友所藏的《金瓶梅》，並在日記裡批評：「大抵市諢之極穢者，而鋒燄遠遜《水滸傳》。袁中郎極口贊之，亦好奇之過。」[55]他對袁宏道(中郎)所論不以為然，但也可見袁中郎對《金瓶梅》的推崇，在當時的文人社群裡逐漸流傳發酵，幾成口碑。

《金瓶梅》既係借《水滸傳》北宋末年武松殺嫂的一段故事揭開敷演的序幕。小說開篇「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其前六回描繪潘金蓮和西門慶偷歡的情節。而武松是清河縣人，因此即以清河縣為故事鋪陳的主要場景。作者巧妙地以偷樑換柱的方式，將明代臨清州的繁華嫁接到宋代的清河縣上。當然，明清時期確實有「清河縣」，一是在直隸的邢臺地區，一是位於江蘇淮陰地區，前者適與山東臨清交界(圖 2)。《金瓶梅》的場景雖設於清河縣，但從其所描寫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與繁華景象而言，當是以位於運河的重鎮臨清州為藍本。令人玩味的是，《金瓶梅》有座相當熱鬧的臨清馬頭：「這臨清閘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56]從《金瓶梅》的描寫來看，清河是座大城市，官府林立；而「臨清馬頭」的規模充其量只是依附於清河縣城。但作者安排這一「臨清馬頭」，恐怕正是換位假藉的筆

54 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外集，卷 9，〈游居柿錄〉，頁 1315。

55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 7，萬曆四十五年十一月五日，頁 66b。

56 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詞話》，92 回，〈陳經濟被陷嚴州府，吳月娘大鬧授官廳亭〉，頁 2a。

法，暗示書中所描繪的宋代「清河縣」其實是以作者當代位於京杭大運河的臨清州為臨摹的場景。

《金瓶梅》裡的主人翁西門慶既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又在「家中放官吏債」，還開了段子舖、生藥舖、紬絹舖與絨線舖等四、五處舖面，主要都與布匹有關。而且「外邊江湖又走標船」，為他辦事的「夥計、主管」高達數十人之多。[57]有一回，西門慶大官人還問起屬下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58]當然，這「標船」可能只是提供船隻採買「布貨」來發賣，《金瓶梅》裡的夥計似乎也不見具有特殊的武藝。不論如何，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在《金瓶梅》成書之際，萬曆年間的臨清，應已有專門用來購置標布的「標船」。由此，對標船上銀貨的載運採取保護的措施，逐漸形成在人力市場上的特殊需求，保標的生意自然興盛起來。大概先有保標的行當，起初可能僅附屬於某個布舖，或許要到入清以後，才逐漸組織成一專業常設的標局。

《金瓶梅》設計這「臨清馬頭」一地，一方面固可以解釋成臨靠清河的馬頭。另方面，晚明的臨清州本就是天下水馬頭的重鎮。清初深受康熙帝賞識，曾入直「南書房行走」的高士奇(1642-1704)在《天祿識餘》有條〈馬頭鑣客〉，援引了《程途一覽》的記載：

> 臨清為天下水馬頭，南宮為旱馬頭，鑣客所集。[59]

57 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詞話》，69 回，〈文嫂通情林太太．王三官中詐求奸〉，頁 3b。

58 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詞話》，66 回，〈翟管家寄書致賻．黃真人發牒薦亡〉，頁 1a。

59 高士奇，《天祿識餘》，卷下，〈馬頭鑣客〉，頁 49。「馬頭」本指以土木築設於河岸，便於船泊。《資治通鑑》中曾記唐穆宗長慶二年「[史憲誠]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浙東史學家胡三省(1230-1302)曾特別註記「馬頭」的本義：「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

《程途一覽》原書疑已散佚，後來關於臨清馬頭的記載，殆皆從高士奇的這段筆記轉引而來。《程途一覽》此處所用水、旱馬頭，當為比擬之詞。意即山東臨清州與直隸南宮縣分別是水道與旱路動線上的兩大貿易商埠。既為商旅輻輳的運輸樞紐，無疑有護送財貨等保全上的需求，自然匯聚許多藉此討生活的標客。顧名思義，《程途一覽》可能是明代中葉以降士商行旅所用的參考類書，諸如《士商類要》、《華夷風物商程一覽》、《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或《士商要覽》等書。[60]在《程途一覽》原書裡的措辭究竟是用「鏢客」抑或「標客」，今無可查對。不過在高士奇援引該書的康熙年間，「鏢客」一詞似乎已經開始出現，並為後人所沿用。如山東棲霞的訓詁學者郝懿行(1755-1825)在其《證俗文》中，多處援引《天祿識餘》以解釋各類俗稱用語，其中提及「都會為馬頭，架手為鏢客」，即以該書轉引《程途一覽》所載為據。[61]再如在梁章鉅(1775-1849)的《稱謂録》裡，更直接將「保鏢」等同於「鏢客」，亦從《天祿識餘》轉引該條筆記為證：

> 鏢客：《天祿識餘》「《程途一覽》云：臨清爲天下水馬頭，南宮爲旱馬頭，鏢客所集。」[62]

從原始的「標」字，漸轉與「鏢」、「鏢」相通並用而論，原本可能僅是籠統地指稱往來貿易的「標布客商」，已逐漸轉義為專指行走江

謂之馬頭。」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卷 242，〈唐紀・穆宗長慶二年〉，頁 7822。

60 寺田隆信在其對山西商人的研究中，已留意各類明清商業書的出版與應用。參見寺田隆信，〈明清時代の商業書〉，頁 299-317。關於商業書所涉及經商活動、商品流通與交通運輸等情況的綜論性專著，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

61 郝懿行，《證俗文》，卷 17，〈方言〉，頁 36b。按：《證俗文》引《天祿識餘》一書，約有 58 處之多。

62 梁章鉅，《稱謂錄》，卷 30，〈保鏢〉，頁 3a。

湖、護衛標商安全與貨銀往返無虞的保標武力。

臨清保標的需求應不限於水運的標船。臨清畢竟是南船北馬的輻輳據點。明清之際的江西寧都人魏禧(1624-1681)在面對「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時，決意杜戶隱居於鄉里的翠微峰，除傳世的《魏叔子文集》之外，魏禧另外撰寫《兵謀》、《兵法》與《兵跡》等兵事專著，此一系列的兵書三部曲較乏後人問津，然而其中實包羅他對前代軍事痛定思痛的全盤檢討。其中有《兵跡》一書，魏禧詳細列舉晚明以降各種民間武力。在該書卷 8「華人編」裡，他首舉臨清之「標兵」，巨商大賈招募這些標兵護送重貲，正是仰賴這些善於騎射的「標兵」，協助其採取陸運的方式，至北方京省一帶經營買賣：

> 【標】臨青北路一帶有標兵，善騎射，用駿馬、小箭。箭曰雞眼，馬曰游龍。往來飛馳，分毫命中。巨商大賈，常募以護重貲，彼與俱則豎紅標，故曰標兵。賊不敢伺。有時爲逆，即是響馬，劫掠孔道，以鳴鏑爲號，聞鳴鏑則響馬至矣。矢不從後發，每逾人之前，行回鏃反向，行路者須棄物走，不則致命。亦有善射者，輒下馬，步趨傍馬之側，張弓向賊，引而不發，彼見之，知爲能手，亦不敢動。響馬與標皆勁兵也。[63]

魏禧所述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標兵為臨清(臨青)的特殊民間武力；二是「標」名乃源於護送的旗幟；三是標兵其實具有依違於黑白兩道的特性：標兵與響馬具有同樣的騎射武藝，儘管標兵職在護送，而響馬意在劫掠，但兩者其實系出同源，不過是正反殊途而已。而魏禧在結語中表示兩者皆「勁兵」，頗有蹊蹺。言下之意，兩者僅一線之隔、一念之差，皆可作為官方招募的兵源，成為捍衛廟堂的軍隊。

63 魏禧，《兵跡》，卷 7，〈華人編・標〉，頁 1。按：現存鉛印本之《兵跡》，刊作臨青，應即臨清，疑為抄印之誤。

臨清保標動員的人力極夥，當然並非只有臨清本籍之人。當時恐怕來自四方、聚集於臨清，圖以保標為生業者大有人在。臨清不僅是布商的集中地，也是保標的集中地。既有布商運銀載貨的大量需求，才可能衍生出護送的生意，並且從原本布商本身招募護送的保標，逐漸發展成專業化的經營模式。若《金瓶梅》成書於嘉靖年間，則書裡所提西門慶經營的標船，仍以布商專屬載運為主，尚無標局提供契約式的定期服務，隨行的伙計也還看不出是否有習武的背景。不過，船跑江湖、車行馬路，常年遠程攜銀或運貨者，難免途經曠野荒郊，或遇迷津陌路，若非本身已備自衛防身之術，則僱傭武林中人保標護駕的需求，自必隨著商貿交通網絡的發達越益提升。位於水陸網絡樞紐的臨清，遂成保標生業蓬勃的溫床。

四、決戰徂徠——劉源清與臨清標兵的最後一役

前述在備戰遼東的奏議裡，儘管可以看出不少官員對招募臨清保標的積極主張，但仍無法確定朝廷是否照准其議，付諸施行，以及是否確有臨清的標兵參與抗清的戰役。

庋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明清檔案中，原屬明代的官方史料僅有四千多件，數量雖少，但彌足珍貴。筆者在檢閱崇禎年間檔案時，發現一份〈署總兵劉源清奏為恭謝天恩等事〉的兵科抄件(圖3)，其中涉及晚明在與大清部隊禦戰的抗衡過程中，招募並動員臨清保標兵力的重要訊息。這份檔案的主角劉源清(?-1643)，雖曾列名於清朝官修《明史》的忠義傳裡，但《明史》僅是在描述前太常少卿張振秀(?-1642)參與抵禦清軍圍城時，提及劉源清，並列入最後一起犧牲的官員名單中：

> 崇禎十五年，大清兵圍河間，遠近震恐。臨清總兵官劉源清偕

> 榷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在籍兵部侍郎張宗衡、員外郎邢泰吉、臨汾知縣尹任及[張]振秀等合力備禦。未幾，城被圍，力拒數日，援不至，城破，並死之。[64]

《明史》的記載簡略，且與實情有不少出入之處。的確，崇禎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兵攻陷臨清，有不少致仕居鄉的官員因此而犧牲。[65]不過當時擔任「署總兵官」劉源清，並非如《明史》所言，於臨清城被清軍攻陷之際殉難。

根據史語所庋藏的殘存明代檔案，大致應可勾勒出劉源清在崇禎年間的重要事蹟，彌補並更正《明史》記載的缺失。劉源清是山東兗州府曹縣人。其兄長劉澤清(?-1649)，原亦為晚明抗清的重要將領，北京陷落後，輾轉投效南明弘光朝，後又變節降清，最終是以勾結山東曹縣的叛賊而伏誅。[66]劉源清於崇禎初年開始嶄露頭角，曾於崇禎四年(1631)擔任山海掛印總兵官，[67]並於翌年獲得朝廷「敘濃濟嶺郵馬山戰功」。[68]崇禎十四年(1641)時，劉澤清曾以「雙股生瘡，不能馳馬」為藉口；又念軍機重務，「暫委胞弟劉源清統兵剿賊」。[69]

---

64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91，〈劉源清〉，頁 7475。

65 張自清，《臨清縣志》，卷 5，〈大事紀．明〉，頁 7b。大事記：「十五年壬午，冬十一月，清兵下臨清，前太常少卿張振秀死之。」

66 據《清實錄》載：「劉澤清勾連曹縣叛賊，謀為不軌，事覺，澤清并弟姪及賊渠李洪基、李化鯨皆伏誅。」見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40，順治五年十月丙辰[廿五]日，頁 325。另方志亦載：「劉澤清，山東曹縣人，闖賊窺臨時，縱兵丁擄民財物，又夜多設火具，欲肆焚殺，偵云賊至，乃走。後以逆誅。」參見：于睿明，《(康熙)臨清州志》，卷 1，〈總兵．明崇禎〉，頁 69a。

67 《明實錄．崇禎長編》，卷 51，崇禎四年十月己酉[九]日，頁 2967。

68 《明實錄．崇禎長編》，卷 51，崇禎五年二月戊子[二十]日，頁 3301。

69 〈移會鎮臣楊御蕃檄行副將劉源清統兵剿〉，崇禎十四年七月，中央研究

史語所庋藏的這份兵科抄件——〈署總兵劉源清奏為恭謝天恩等事〉，封面註明為「崇禎十六年正月六日到[兵]部」。時任防護山東東兗東路署總兵官的劉源清，在奏本中除了恭謝天恩、趨赴新命之外，更重要的是奏請「移虛懸募額以補東兵事」。劉源清的原奏，應即是在清軍攻陷臨清之後所發。當時山東巡撫王永吉(1600-1659)立即題奏朝廷，由於臨清乃「咽喉重地，居守不可無人」，朝廷隨即命令劉澤清「還守臨清」，而原存的三千兵員，則委由劉源清統領以防護東兗。但劉源清清查兵力之後，發現兵員短缺，必須趕緊招募：

> 察臨清留兵三千，止有分防新募一千，其留臨二千，已經東鎮塘報：城陷守死，化為烏有。今臣所統募兵尚在虛懸無著，更念戎馬孔棘，戰守正殷，合無即以臣見，募保標之兵以充三千之數，領臨鎮之餉，則兵將相習，呼吸可靈。總在封疆之用度，免臣另募之遲。伏候聖裁，臣不勝悚仄待命之至。崇禎十陸年正月初四奉聖旨：奏內以保標募兵、充領臨餉，該部即行察覆。[70]

原本留防於臨清的三千員額，已隨著臨清一役化為烏有。因此他計畫「募保標之兵以充三千之數」，也就是從保標行業裡招募高達兩千多名的新兵，同時以臨清州的糧餉(文中所指「臨餉」)來支付照應這批新募的保標員額。史語所館藏的這份兵科抄檔，封面註記崇禎皇帝於正月初四日降旨，而兵部收到奏本批紅是在崇禎十六年正月六日，次日即察覆皇帝裁奪。不過無法從這份檔案裡判讀後來兵部察覆的結果，以及皇帝最終如何定奪。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201331；亦收錄於《明清史料》，癸編，第 2 本，頁 190。

70 〈署總兵劉源清奏為恭謝天恩等事〉，崇禎 16 年 1 月 4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035151-001，並收錄於《明清史料》，辛編，第 9 本，頁 849。

然而史語所另存藏有一份同時間的兵科抄件，反映出朝廷對劉源清在防護東、兗兩府時的失職，極不滿意。針對劉源清「奏為恭承新命等事」，兵科嚴加抨擊：

> 劉源清既受防護東、兗之命，則凡兩郡之一城一邑，皆所當防；一草一木，皆所當護。乃受命於[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九日，而兗郡告陷即在十二月初八日。誠不知源清之防者何事？護者何地？至東昌徼倖保全，尤係源清所傾陷之馬岱奮力擊却。是源清於兗府既為有罪，於東昌仍屬無功。乞請專敕，蓋求為淹覆從前之計。業蒙俯允，是聖明已弘開使過之仁，源清當急圖桑榆之効，如仍前逗怯，仰負皇仁。本科職掌所在，當即以白簡直糾，以定後日功罪之案，以明天下是非之公，寧能嘿嘿已乎！[71]

朝廷對劉源清銜命防護東昌、兗州兩府的表現顯然極為不滿，並指出他這份題奏，表面上依例進繳所有募練的敕書一道、關防一顆，但同時又「仰祈皇上俯賜東兗敕書，便臣欽遵行事」。兵科直指他意欲藉此來掩蓋其防護失職，歸因於尚未獲得朝廷賦予全權，同時也強調皇帝仍廣開弘恩，不計前嫌，期許他能「急圖桑榆之効」。究其實，此時山東局勢岌岌可危，清軍隨時可能突圍，進而兵臨北京城下，明朝廟堂正命懸一線，朝廷至此恐怕也別無懸念，除了以官箴的訓誡與道德的規範，冀望劉源清能正視「後日功罪之案」與「天下是非之公」，所以仍交付其全權統籌「封疆之用」。由此推斷，朝廷對劉源清「募保標之兵以充三千之數」，並運用臨清糧餉的計畫，應如其所擬施行。

然而，朝廷對劉源清寄予的厚望，最後仍不幸落空。根據劉源清兄

71〈劉源清為進繳募練敕書關防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崇禎 16 年 1 月 6 日，登錄號 201412-001，並收錄於《明清史料》，癸編，第 3 本，頁 293。

長劉澤清的塘報，劉源清最後是在崇禎十六年(1643)二月五日，率領精銳三千與清軍會戰於泰安的徂徠山。最後卻「血戰力竭」，幾乎全軍覆沒。

徂徠山位於東嶽泰山南 30 里之處，是東嶽的「案山」，上有紫源池，下有玲瓏山與獨秀峯(圖 4)。[72]著名的北宋思想家石介(1005-1045)即築室於此，著書講學，學者稱「徂徠先生」。[73]根據史語所庋藏崇禎朝「塘報孤軍死戰捐軀報國事」的兵部題稿(殘本)，劉源清在二月初五日率領部隊，前往青州救援，但就在泰安徂徠山「撞遇虜賊大隊」，當清軍以「大營包來，衝開步營」，劉源清所率領的親丁「登時俱戰死，只剩二十餘人，被奴圍在山坡，與賊對□」。最後劉源清「被圍落馬」，當時他「面中一矢，身中二矢」。又依據後來曾被「達子」擄去餵馬的「□[逃]出難民口供」，這些難民親眼看見：

> 劉三總兵[劉源清]被達子架至達王面□[前]□□[要他]跪，不肯跪；問他話，也不肯說；少間，大聲罵起，被擁□□□[營]外殺了(圖 5)。[74]

這一役損失極為慘重。劉源清所招募的鄉勇「十傷八九，止于親丁二十餘人」生還。劉源清原本是在劉澤清的授意下，「倡募西三府鄉勇制挺從戎」。「西三府」指的就是位於山東西部的濟南、兗州、東昌

72 詳細形勝可參見：顏希深修，成城纂，《(乾隆)泰安府志》，卷 3，〈泰安縣〉，頁 6b-7a。

73 陸弢纂修，《(嘉靖)山東通志》，卷 5，頁 13a。

74 〈兵部為塘報孤軍死戰捐軀事〉，崇禎 16 年 3 月 8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035022；另收入《明清史料》，乙編，第 6 本，頁 575。按：塘報乃攸關兵戎之情報。明朱國禎(1558-1632)曾解釋「塘報」：「今軍情緊急走報者。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改曰塘報。」但他對「塘報」的取義亦「未解所謂」，僅引周密《齊東野語．馬塍藝花》所言「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進而揣測「『堂』一曰『塘』，其取之此與？」見朱國禎，《湧幢小品》，卷 12，〈塘報〉，頁 261。

三府，相對於青州、萊州與登州等東三府。在發兵之前，劉源清派人傳遞家書給劉澤清，表示當時他已經按照先前的規畫，募得「義勇萬餘」，準備從泗水、蒙陰進發。但因劉澤清提醒他鄉民未經訓練，擔心他「籌虜太易，恐甚輕敵墮狡」，後來劉源清僅「挑選精銳三千」，準備會合大軍夾勦清兵。萬沒想到就在徂徠山與清軍會戰。這三千精銳的義勇，應該包括在東昌府招募到臨清的保標兵力。如果說劉源清真能依照當初向朝廷題奏的計畫，不到一月就順利招募到臨清的兩千標兵，而且馬上披掛應戰，就表示這批從浪跡江湖轉效朝廷軍旅的保標鄉勇，終不敵後金國席捲的正規部隊，幾乎盡喪於徂徠山之役。

大明江山在內外交迫之際，危如累卵，即使動員了江湖上各路的英雄好漢，不論是少林的僧兵、河南的毛兵，或是臨清的標兵，終究無法旋乾轉坤。原本定鼎的廟堂此時儼然已變成逐鹿的江湖。

五、亡命天涯——國變中標客的最後身影

清初大臣魏裔介(1616-1686)曾論列明朝末葉的各種弊端，特別批判晚明召募民間武力一事。他認為明朝設置衛所，藉以蓄兵養馬、武備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然而明末因「天下多事」，朝廷苦於衛所之軍不足為用，因此召募各種「民間之驍悍者」進入軍伍。殊不知——

> 此輩多四方無籍之徒，主將得人，養之厚而馭之嚴，亦能有功，否則鼓噪逃竄，去而為盜。明之流賊，雖起於饑民，實由此輩蓦入其中，為之雄長，往往有弓馬技藝精熟過人者，李自成、張獻忠皆逃兵中渠魁，故官兵逼之而潰，如饑民烏合，雖百萬，

亦不能戰也。[75]

魏裔介的反省，雖是後見之明，但也的確指出當時國家危亡之際，朝廷陷入病急倉皇投醫的窘境。明朝本欲仰賴江湖英雄救亡圖存，但卻終被草莽之士登堂入室。晚明流寇的坐大，恐怕其中確有不少是曾混跡軍伍之人，而這些烏合之眾，或可擾亂世局於一時，最後仍無法對抗清軍訓練有素的勁旅。

當甲申年(崇禎十七年，1644)流寇入京，廟堂一夕淪為江湖。臨清保標武力為明朝效命以至犧牲的事蹟，幾乎隨之沉埋歷史。清初紹興府諸暨高湖人余縉(1617-1689)在追記其伯兄余綸(字岸修)於甲申之變時換裝南還的過程中，有一段關於標客掩護滯京南方士人潛逃歸鄉的故事。這段記載想必是余綸向族內子弟反覆口述的一段歷史記憶。畢竟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是發生在他個人生涯同大時代命運的轉折點上。

余綸原為崇禎十六年(1643)癸未科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該癸未科是明代進士科舉的最後一榜。只不過這末代金榜上的進士注定命運多舛；在獲得鯉躍龍門的欽點之後，他們成為最後一批必須列班效忠的明朝屬臣。一旦國更天換，功名轉瞬間變成詛咒，他們必須面對進退出處的抉擇。當年的狀元為南直隸武進人楊廷鑒(1603-1655)，在崇禎十七年三月闖王李自成(1606-1645)攻佔北京後，他曾試圖變裝潛逃，卻不幸被人識破，只得返回弘文館擔任修撰。直到李自成潼關一役兵敗後西竄，楊廷鑒則趁機投奔南明，南明亡後，又被清廷所收編。

當時列名楊廷鑒榜上的余綸和同年兼同鄉的史繼鰱兩人也趁著亂局逃出北京。[76]一年前兩人同登金榜，正值春風桃李，沒想到轉眼

75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 14，〈明季利弊論〉，頁 374。

76 據乾隆《紹興府志》所載人物事略：「史繼鰱，字矢如，諸暨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適闖賊陷京師，棄職旋里，隱居教授者數載，卒于家」。李亨特修，平恕纂，《(乾隆)紹興府志》，卷 54，〈人物志・文苑・

間國更天換，卻迎夜雨江湖。他們原本是計畫從臨清搭船南返，但患水道險阻，於是策蹇陸行，一路上從臨清轉往濟寧。當他們快要抵達濟寧之際，忽然聽到一群人馬馳驟之聲，須臾間數百坐飛騎蜂擁而過。驚恐之餘，他們只得引騎避立道左，讓這群人馬先行，就在雜沓聲中擦身而過的當口，余綸剛好瞥見尾隨在後的幾匹坐騎裡，竟有一位變裝的同年歸起先，歸起先恰巧也對目相視，於是「舉手微笑，振策馳去」。余綸詢問隨從之人，「始知前騁者江南標客，而三吳士大夫變服以從者也。」[77]

余綸的這位同年歸起先是江蘇常熟人，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崇禎十七年正月授刑部主事提牢。然就任不到月餘，闖王李自成即攻陷京城。在歸起先授職之初，家中傳來父親病篤的消息，他曾連夜草疏乞終養例，未得朝廷俯允；後再從堂上官請給假出城候命，又遭駁回。當時不瞭解其中內幕曲折的地方鄉紳，以為遠在京城的歸起先已然接受某防禦使或某縣令之職，[78]甚至聯名發佈〈嘗熟縣討叛公檄〉，痛斥那些「位列六卿、身躋青鎖、世受國恩、名參甲榜」的在京同鄉，竟然「婉孌于賊庭，乞生于虎口」。而其中歸起先亦遭到點名批判。[79]經余綸這段追憶的揭露，歸起先脫困離京的曲折才真相大白：原來他是變裝混跡於標客之中，披星南還，回到常熟故里，終得向鄉里父老澄清誣冤。後來歸起先的三子歸允肅(1642-1689)在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殿試拔得頭籌，成為清朝第十六位狀元。而歸起先本人也在康熙皇帝的

明・史繼鰭〉，頁 39b。

77 見余縉，《大觀堂文集》，卷 18，〈伯兄岸脩甲申南旋逸事記〉，頁 1a-7b。

78 參見計六奇，《明季北略》，卷 22，〈吳文熾〉，頁 56b。

79 本縣士民(署名)，〈嘗熟縣討叛公檄〉，收於馮夢龍，《甲申紀事》，卷 8，頁 494-495。按：原文即作「嘗熟」。

覃恩下，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祇領翰林院的修撰一銜。[80]

回首甲申之變當年，歸起先之所以能自賊廷虎口脫身，終得返鄉明志洗冤，當歸功於那群標客的掩護，成就一段江湖佳話。研判那群標客當初所規劃的路線，理應也和余綸等人一樣，由於考慮到水道險阻，因此從臨清改走陸路，於是數百騎的人馬浩浩蕩蕩一路朝南奔馳。而清初余縉所追記的這段軼聞，可能正是在國更天換之際，文人記憶書寫裡所捕捉到這群江湖標客的最後身影。

六、結論——草莽戰沙場——從江湖標客到廟堂標兵

「標局」作為一專有名詞，從晚清以降即收錄於辭書或百科全書之中。在黃人(1866-1913)主編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911)裡，曾對「鏢局」一詞提出相當詳贍的詮釋：

> 鏢，為馬之鉄勒口。鏢局專制響馬，故取其義。或以其所用鉄鏢為解，則坿會。蓋亦保險之一種。而在我國，則又為一地方、一社會之特別營業。凡有挾重資行北五省者，慮盜劫，則乞鏢局保護，計資多寡出費，于是局中派人護之行，是曰保鏢。行裝上有特別徽識，曰鏢旂。盜遇之，則揖讓而過，蓋別有秘密契約，不盡恃武力也。若遇劫，則局照償所失。凡鏢局，皆滄州人設。即局員非滄人，而必以滄為標。此種國民之尚武精神，與山西票號之經濟手段，皆國粹也。[81]

這段說明大抵對標局的運作經營進行基本的勾勒，如標局之設主要是因應護送重要財貨的需求，甚至保標行走江湖可能與道上劫盜間建立

80 歸起先之傳略，可參見高士驥、楊振藻修，錢陸燦等纂，《(康熙)常熟縣志》，卷 18，〈邑人〉，頁 56a-57b。

81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補遺．鏢局〉，條 220，頁 30。

一定的默契。不過，該辭書的解釋仍有不少值得推敲之處：首先，編者澄清「鑣」字的本意應是駕馭的馬勒，而非使用的兵器。這其實並非編者自出胸臆的新解，按照《說文》的界定，「鑣」字確實是指「馬銜」，[82]不過黃人將之比附為專制響馬的寓意，倒是別出心裁。他又指出標局皆為直隸滄州人所設置，亦未免過於武斷。儘管滄洲人素負習武盛名，但若說標局是滄洲人壟斷的生業，則與歷史實情出入頗大。最後，黃人還將標局聯繫到國民尚武的精神，與山西票號並稱為國粹。[83]

有趣的是：「著論求為百世師」的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裡也將「響馬」與「標客」並舉：

> 燕、齊之交，其慓悍之風猶存。至今響馬、標客，猶椎埋俠子之遺。[84]

「椎埋俠子」一典，出自《史記‧酷吏列傳》裡王溫舒(?-104 B.C.)年少殘暴的事蹟。不過王溫舒出身陽陵，應屬秦地(約為今之陝西咸陽之東)，嚴格而言並非燕、齊之交。《史記》描寫他「少時椎埋為姦」，意即他年少時

82 許慎，《說文解字》，卷 14 上，頁 8。

83 武術開始在清末民初受到重視，無疑與國族主義的興起有關，故經常冠以「國術」之名。反映在方志的編纂上，就是開始載錄地方上以習武任俠顯跡者，例如民國山西省《浮山縣志》特別開列「技術」一卷，專載武術、醫術等「國術」。其前言特別引孔子「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同時指出「今中央崇尚國術，因都為一集」。言下之意，似乎為了呼應「中央」的呼籲。該卷收錄不少與保鏢有關的武術名家：如名列首位的俠盜魏淼「專劫貪官污吏之為暴于民者」，其徒弟張某從業於鏢局。精通少林拳的吉老二，先世曾為鏢師，在運鏢使棒以及氣功方面皆有可觀。此外，尚有與魏淼齊名的齊老二，曾以掃躺腿的絕活，享譽於河南、河北等地。在太平天國的對陣中，齊家兄弟三人更以「三角對背」的戰術衝出包圍。齊老二另外的著名事蹟便是在太行山山徑中擊退劫鏢的匪徒。任耀先修，張桂書纂，《(民國)浮山縣志》，卷 31，〈技術〉，頁 1a。

84 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頁 90。

不僅殺人越貨，甚至毀屍滅跡。後來王溫舒因緣際會進入公門任職，特別選擇郡中豪勇十餘人當其爪牙，並把持每個人過去的隱私重罪，放手讓他們去督捕盜賊。結果齊趙相界的盜賊不敢侵擾他的轄區，博得路不拾遺的政譽美聲。[85]王溫舒可說是挾持黑白兩道而為共主的早期典型。梁啟超將標客與響馬並舉，雖指兩者慓悍之風皆源於其地理習尚所致，但俠與盜兩者的區隔，有時的確就僅在一線或一念之間。而如果追溯其源，標客與響馬可能就是前引魏禧記載明末活動於山東臨清北路的標兵。

本文嘗試以官方檔案文書的記載為中心，探討在江湖上流傳甚久的保標形蹤影跡。首先確定了本來做為民間武力的保標，在面對東北女真勢力的崛起時，成為廟堂徵召的兵源，最後更投身於明與後金對壘的戰役中。而作為南北航運交通樞紐的山東臨清，對保標行當的興起與發展，無疑扮演著孕育催生的關鍵角色。

迨至清中葉以後，原本正規的八旗勁旅與綠營部隊，逐漸喪失其戰鬥力。因應內外隱隱蠢動的危機，如何動員民間武力以為官方軍事奧援，再度成為朝廷殫精竭慮的重要課題。曾擔任湖南巡撫姜晟(?-1806)經理苗疆時幕僚的嚴如煜(1759-1826)，於嘉慶五年(1800)應試孝廉方正科時，提出《平定川、楚、陝三省方略策》，他在〈三省山內邊防論〉裡建議應積極將兩種人納入團練之中：一為普通的州縣民壯，一則為特定的武林奇俠。而後者之中，又有兩類人物值得官府著意收編：一是在山野間尋狩的獵戶，因為這些獵戶「平時專

85 後來王溫舒因被出賣而畏罪自殺，殃及五族，詳見司馬遷，《史記》，卷122，頁3149-3151。後世官箴書多引王溫舒的事蹟，當作為官任事的負面教材，例如徐元瑞著，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頁140；陳弘謀，《在官法戒錄》，收入《官箴書集成》，卷4，頁52b-53a；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收入《官箴書集成》，卷4，頁36b-37a。

驅虎狼之爲民害者，其火銃百不失一，五溪蠻無以踰之」。[86]再者就是行走江湖的標客：

> [又]各廠中防嘓匪劫掠，有標客拳勇技擊，一可當十。往時有捐重貲，募數百人護輜重者，獨無失亡。或大軍有急，揮此輩援之，往往轉敗為勝。古名將破賊必蓄選鋒，此足備軍鋒之用，不事外求者也。[87]

嘓匪指的是四川嘓嚕，亦稱「嘓嚕子」。四川殆經明末兵燹後人口急遽銳減。朝廷曾宣導湖廣、江西、陝西、廣東等外省移填四川，然入川移民之無業之人，有些人遂以學習拳棒、符水架刑，從而肆行鄉鎮。早在乾隆四年(1739)四川巡撫方顯(1676-1741)曾上奏指出：「川省惡棍，名為嘓嚕子。結黨成群、暗藏刀斧，白晝搶奪，乘夜竊刦。」[88]直到清末，嘓嚕子始終是川省最為棘手的禍患。嚴如煜這篇〈三省山內邊防論〉的建言，雖是針對苗疆三省的邊防而發，但卻經常為晚清編纂的方志、官箴書與經世文編所援引。[89]當然，收編江湖上的奇人異士，史上經見，並非新聞。咸豐三年(1853)十月底欽差大臣琦善(1786-1854)在

86 嚴如煜此處所指「五溪蠻」，蓋指活動於黔、川、鄂三省交界處沅水上游的少數民族。《南史・夷貊傳下》：「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見李延壽，《南史》，卷 79，〈夷貊〉，頁 12b。

87 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頁 34a-34b。

88 慶桂等奉敕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3，乾隆四年十月癸卯[三十]日，頁 559b。

89 例如：余修鳳，《(光緒)定遠廳志》，卷 5，〈地理志・風土〉，頁 9b；朱子春修，《(光緒)鳳縣志》，卷 8，〈風俗志〉，頁 7；張鵬翼，《(光緒)洋縣志》，卷 7，〈風俗志〉，頁 7b；張機高，《(民國)佛坪縣志》，卷下，〈雜記志・附府志山內風土〉，頁 18b；戴肇辰，《學仕錄》，卷 12，〈三省邊防備覽策略〉，頁 23a；徐棟輯，《牧令書輯要》，卷 9，〈三省邊防備覽策略〉頁 56b-57a；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兵政・三省山內邊防論〉，卷 82，頁 16。

收復揚州城的過程中，就有投效其麾下的一位標客建功。這位孫姓標客擔任千總一職，能一躍登上十餘丈的炮臺，眺望城中炊烟不起，聞四壁鳥烏聲樂，確定叛軍已經遠去，於是飛稟琦善。隨後並由南城抵北門，復繞東門而出徐寧門，清查四處敵蹤。[90]其所擔任的角色，雖非破敵之前鋒，但卻是偵敵之前哨。

當國家常備的正規軍隊無法勝任日益告急的邊防，或四處蠭起的內亂時，江湖上的民間自衛武力往往成為廟堂臨危應急的選項。對比前引晚明因應外敵時徵召民間武力的倡議，晚清嚴如煜招納標客的建言，確實讓人有隔世卻似曾相識之感。十七世紀初期明朝曾一度試圖將保標納入軍隊的編制，而在十九世紀初期標客的武藝再次受到青睞，一度被寄望能輔補官方兵力之不足。江湖的俠客再度成為拯救廟堂的奇兵。只不過，藉助保標這類的民間武力恐怕也只能治「標」於一時，據傳庚子拳亂，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之際(1860)，西太后慈禧(1835-1908)倉皇出宮，一方面亟需熟悉沿途路況的嚮導，一方面又有強化警備護衛的考量，於是先逃往張家口，再由當地東廣玉與西廣玉兩家標局接駕，引領護送西太后一行人前往西安。[91]

前賢曾論斷標局是顧炎武協同傅山等文人遺民為反清復明而設，然並未引據憑證，未免流於浪漫的想像。實則臨清護送標客的江湖武力早已投身於明末的抗清戰役中。儘管其中或有不少「草野忍看天下亂」的俠義之士，[92]這群臨時投充行伍的臨清標兵，亦或許個個身懷

90 事蹟詳見佚名，《廣陵史稿》，卷 1，〈世琨傳〉，頁 8a-20b。

91 久下司編，《鏢局》，無頁碼。承蒙村田雄二郎教授協助複製該書，謹此致謝。按：該書載慈禧太后西逃一事是在咸豐九年八月底英法聯軍焚園明園之後，恐為誤記。英法聯軍焚園明園是在咸豐十年(1860)，時為「懿貴妃」的慈禧隨咸豐帝前往熱河避暑山莊避難。

92 此借「東林三君」之一的趙南星詩句，見趙南星，《趙忠毅公詩文集》，卷 5，〈聞遼東虜退之二〉，頁 7b。

才不世出的武功絕技，但無法整合成一訓練有素的正規部隊，一時拼湊的烏合之眾臨陣沙場，終究難敵屢經戰陣而節制有度的八旗勁旅。

當國家命懸一線時，行走江湖的俠客搖身一變成為保衛廟堂的士卒。這批臨時應急收編的民間武力，在平常或許可以弭平江湖上的小風小浪於一時一地，但終究無法扶正將傾的廟堂大廈、挽回既倒的歷史狂瀾。

(本文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收稿，2018 年 7 月 25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6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9 月出刊。)

*本文撰擬期間，先後承蒙陳國棟、劉錚雲、衣若蘭、何淑宜、魯大維(David Robinson)、沙培德(Peter Zarrow)與葉天賜等先生提點與切磋，復得兩位匿名審查學者費心批閱。修訂過程中，何幸真、楊肅毓、施厚羽、阮思瑀、許凱翔與林柏安等學友協助檢校增改，字字真金，謹此特申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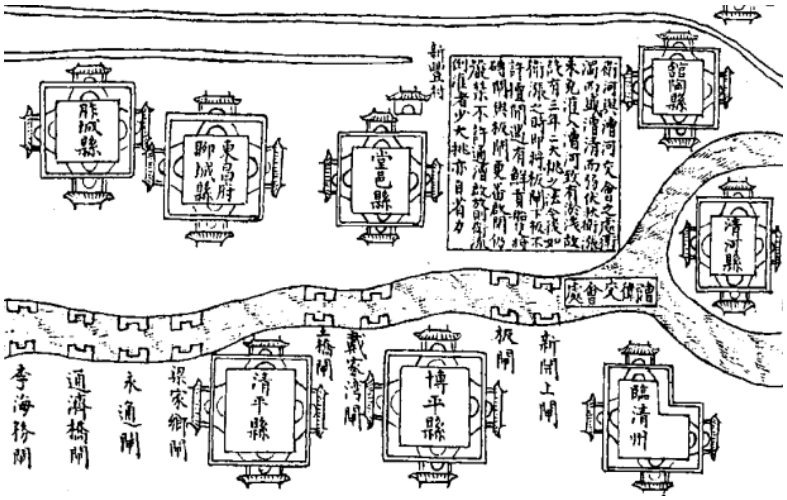
圖 1　明代京杭大運河路線圖



說明：臨清州為山東河段(會通河)的樞紐。

資料來源：參考王瓊，《漕河圖志》、謝純，《漕運通志》，卷 1，〈河圖〉、朱思本繪，羅洪先增纂，《廣輿圖》，卷 2，〈漕運圖〉與潘季馴，《河防一覽》，卷 1，〈全河圖說〉等書繪製。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專題中心協助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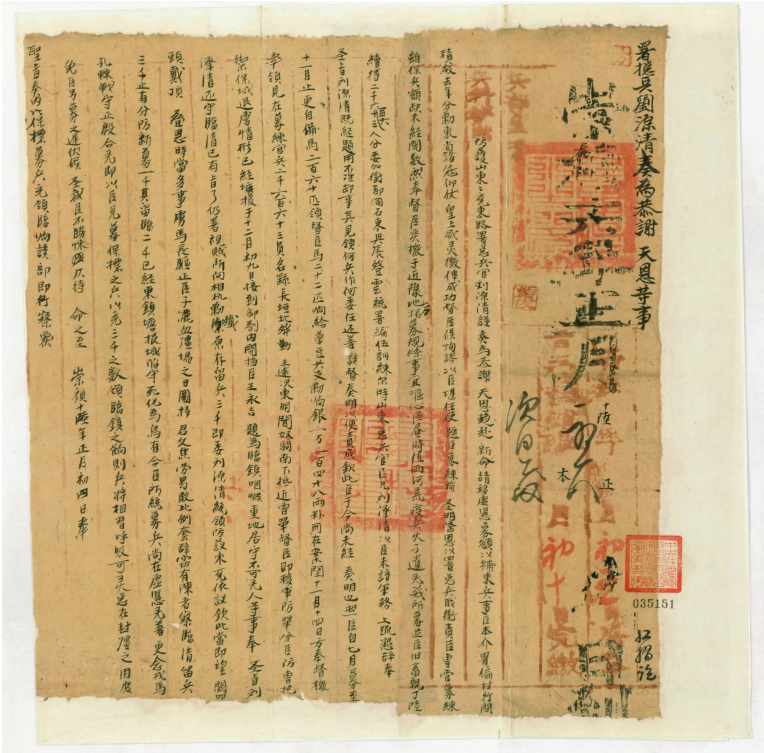
圖 2　漕衛交會處之臨清州與清河縣



說明：此圖顯示臨清州(隸屬山東東昌府)與清河縣(隸屬直隸廣平府)的相對位置。

資料來源：潘季馴，《河防一覽》，卷 1，〈全河圖說〉(局部)，頁 147b，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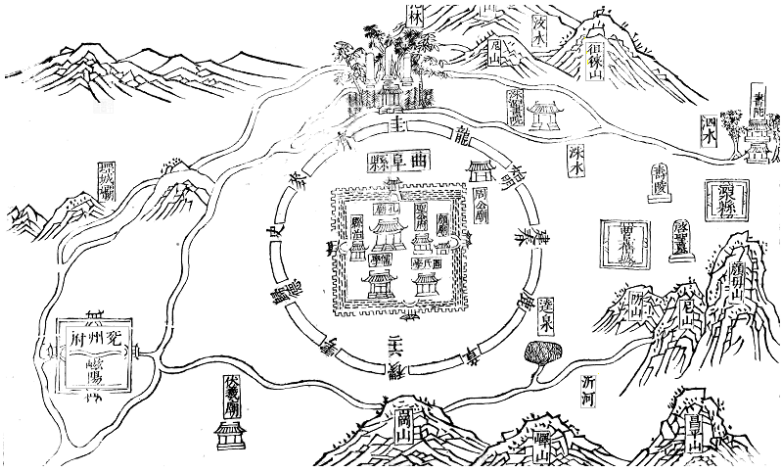
圖 3　劉源清奏請召募臨清保標兵丁充軍案



說明：奏文內提議「募保標之兵」(左起三行)；末尾並奉聖旨批示：「以保標募兵」。

資料來源：〈署總兵劉源清奏為恭謝天恩等事〉(兵科抄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035151-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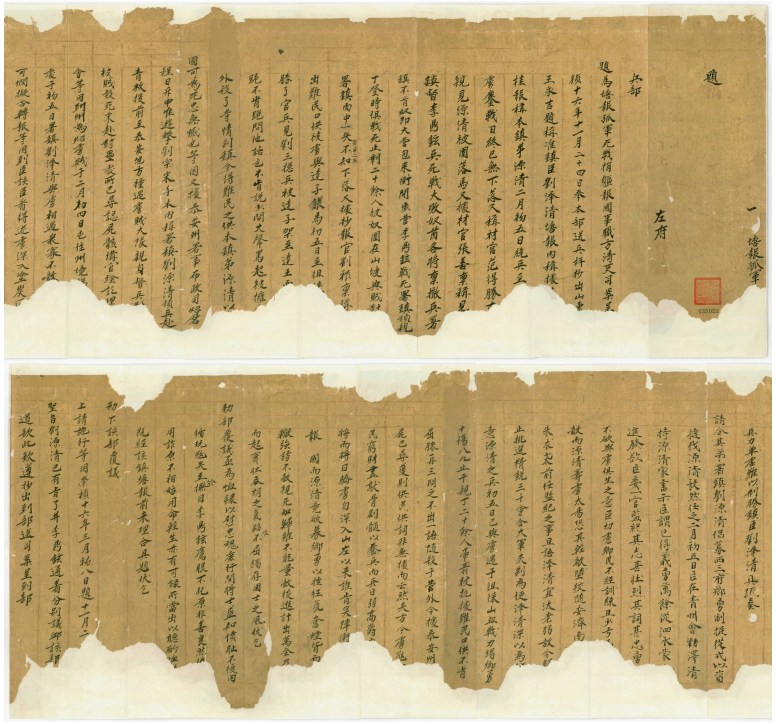
圖 4　曲阜縣周邊地理與鄰近州縣



說明：該圖顯示徂徠山、泗水縣、兗州府之相對位置。

資料來源：趙祥星修，錢江纂，《(康熙)山東通志》，卷 1，〈闕里圖〉，頁 26a-b，據清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影印。

圖 5　塘報劉源清戰死徂徠山一役



說明：上文提及劉源清被俘至「達王」面前，終遭殺害(左十行起)，下文提及劉源清領三千精銳於徂徠山遭敵殲滅，僅親丁二十餘人生還。

資料來源：〈兵部為塘報孤軍死戰捐軀事〉(殘本局部)，崇禎 16 年 3 月 8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035022。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兵部為塘報孤軍死戰捐軀事〉，崇禎 16 年 3 月 8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035022。

〈移會鎮臣楊御蕃檄行副將劉源清統兵剿〉，崇禎 14 年 7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201331。

〈署總兵劉源清奏為恭謝天恩等事〉，崇禎 16 年 1 月 4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035151-001。

〈劉源清為進繳募練敕書關防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 201412-001。

于睿明，《(康熙)臨清州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9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清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影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 34 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8。

孔尚任著，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濟南：齊魯書社，2004。

王瓊，《漕河圖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第 83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膠卷影印。

王韜著，沈恒春、楊其民標點，《瀛壖雜志》，收入《上海灘與上海人叢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

任耀先修，張桂書纂，《(民國)浮山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 416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刊本影印。

朱子春修，《(光緒)鳳縣志》，收入《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西北卷，第 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據清光緒十八年[1892]刊本影印。

朱思本繪，羅洪先增纂，《廣輿圖》。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據明萬曆七年[1579]刊本影印。

竹溪山人，《粉粧樓》，收入《古本小說叢刊》，第 23 輯，第 4-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桑原文庫藏清嘉慶二年[1797]寶華樓刊本影印。

余修鳳，《(光緒)定遠廳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 270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據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

余縉，《大觀堂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67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據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後印本影印。

佚名，《大明繡像小紅袍全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道光十二年[1832]年厦門文德堂刋本影印。

佚名，《海公案》，收入李珠、陳鵬編，《明清公案小說系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佚名，《廣陵史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4 輯，第 1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鈔本影印。

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3 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據民國嘉業堂叢書本影印。

李亨特修，平恕纂，《(乾隆)紹興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 221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影印。

李延壽，《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1，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

李春芳編次，《海公大紅袍全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據北京大學所藏道光十三年[1833]乾元堂本影印。

李夢陽，《空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汪楫編，《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舊鈔本影印。

汪灝等編，《佩文齋廣群芳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9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三年[1877]傳氏長恩閣抄本影印。

周密，《齊東野語》，收入朱國禎，《湧幢小品》，上海：中華書局，1959。

岳濬修，杜詔纂，《(雍正)山東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9-54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祁彪佳，《宜焚全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9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末抄本影印。

姚之駰，《元明事類鈔》，收入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 5 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計六奇，《明季北略》，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編，《中國野史集成》，第 36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據清末刻本影印。

徐元瑞著，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徐石麒，《可經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清順治可經堂刻本影印。

徐珂，《清稗類鈔》，收入《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第 8 編，第 59 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據民國六年[1917]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影印。

徐棟輯，丁日昌選評，《牧令書輯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55 冊，據清同治七年[1868]江蘇書局刻本影印。

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詞話一百回，附繪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二年[1933]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本。

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

郝懿行，《證俗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年[1884]東路廳署開雕刊本。

高士奇，《天祿識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刊本。

高士儀、楊振藻修，錢陸燦等纂，《(康熙)常熟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21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影印。

張自清，《(民國)臨清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 3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影印。

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據清武英殿本影印。

張照，《石渠寶笈》，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子部藝術・書畫》，子部，第 437-439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清乾隆內府朱格抄本影印。

張瑞圖，《白毫菴》，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張萱，《西園聞見録》，收入李勇先主編，《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第 10 編，第 69

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據民國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影印。

張機高，《(民國)佛坪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 26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據民國十八年[1929]抄本影印。

張濤修，謝陛纂，《(萬曆)歙志》，收於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 123-12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據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影印。

張鵬翼，《(光緒)洋縣志》，收入《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西北卷，第 1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據清鈔本影印。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收入于浩輯，《明代名人年譜》，第 5-6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據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影印。

戚繼光，《戚少保文集》，收入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據明崇禎年間雲間平露堂刊本影印。

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收入《飲冰室合集》，第 4 冊，上海：中華書局，1941。

梁章鉅，《稱謂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光緒十年[1884]刻本影印。

清高宗敕纂，《清實錄・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畢自嚴，《度支奏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1633]刊本。

許慎，《說文解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本藏影印。

陳方瀛，《(光緒)川沙廳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 174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

陳弘謀，《在官法戒錄》，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 4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據清彙文堂藏板影印。

陳龍正，《幾亭外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陸釴纂修，《山東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7-188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傅夏器，《重刻叔祖錦泉先生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 輯，第 2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續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9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本藏影印。

程宗猷，《蹻張心法》，收入釋永信主編，《中國武術大典》，第 16 冊，北京：中國書店，2012，據明天啓耕餘剩技本影印。

程開祜，《籌遼碩畫》，收入謝國禎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 1 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清光緒十二年[1886]思補樓重校本影印。

鄂爾泰等奉敕纂，《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鄂爾泰編，《授時通考》，收入曲延鈞主编，《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9-10 冊，合肥：安徽美術出版，2002，據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影印。

馮夢龍，《甲申紀事》，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弘光元年[1645]刻本影印。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宣統三年[1911]上海國學扶輪社校印本。

楊洵、陸君弼等纂修，《(萬曆)揚州府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25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溫體仁等纂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萬籟聲，《武術匯宗》，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 1 編，第 5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商務印書館 1929 年版影印。

褚華，《滬城備考》，據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影印。

趙知希纂修，張興宗增修，《(乾隆)館陶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 40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清光緒十九年[1893]重刊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影印。

趙南星，《趙忠毅公詩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6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

趙祥星修，錢江纂，《(康熙)山東通志》，收入《中國地方集成》，山東省志輯，第 1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影印。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8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上海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慶桂等奉敕纂，《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潘季馴，《河防一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錢肇鼇，《質直談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巾箱本。
戴肇辰，《學仕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2 輯，第 2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影印。
謝純，《漕運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第 83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七年[1528]楊宏刻本影印。
顏希深修，成城纂，《(乾隆)泰安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63-6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影印。
魏裔介，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魏禧，《兵跡》，收入豫章叢書整理編輯委員會編，《豫章叢書》，子部，第 1 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問影樓輿地叢書本排印。
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 8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據清咸豐二年[1852]刊本影印。
顧炎武，《肇域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鈔本。
顧秉謙等纂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二、近人論著

久下司編，《鏢局》，張家口：西北事情研究所，1943。
川勝守，《明清貢納制と巨大都市連鎖—— 長江と大運河》，東京：汲古書院，2009。
加藤繁，〈標局〉，收入加藤繁，《支那學雜草》，東京：生活社，1944，頁 127-132。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1972。
方彪，《鏢行述史》，北京：現代出版社，1995。
方彪，《京城鏢行》，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
成淑君，〈自是神人同愛國，歲輸百萬佐昇平——明代泰山碧霞靈應宮香客經濟初探〉，《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3(濟南，2003)，頁 38-41。
曲彥斌，《中國鏢行》，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4。
佚名，《江湖走鏢隱語行話譜》，收入曲彥斌，《中國民間隱語行話》，北京：新華出

版社，1991。
李堯臣口述，〈保鏢生活〉，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頁 229-246。
李金龍、劉映海，《清代鏢局與山西武術》，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7。
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稅新考〉，《臺大歷史學報》，53(臺北，2014)，頁 37-132。
金庸(查良鏞)，《金庸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
陳國棟，〈保標考〉，《食貨月刊》，14：5-6(臺北，1984)，頁 30-39。
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許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
傅崇蘭，《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齊如山，《齊如山隨筆》，臺北：中央文物，1953。
蔡泰彬，〈泰山與太和山的香稅徵收、管理與運用〉，《臺大文史哲學報》，74(臺北，2011)，頁 127-179。
衛聚賢，《山西票號》，新竹：說文社書社，1977。
澤田瑞穗，〈泰山香稅考〉，收入福井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福井博士頌壽記念東洋文化論集》，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69，頁 547-561。
蕭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韓光輝，〈泰山香稅考〉，收入李正明、張杰主編，《泰山研究論叢》，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2，頁 189-197。
Shahar, Meir. *The Shaolin Monastery: History,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二) 影視材料

張徹導演，倪匡編劇，「保鏢」(Have Sword, Will Travel)，香港：邵氏兄弟，1969。

(三) 網路資料

山西「華北第一鏢局博物館」，http://www.hbdybj.com/index.htm, 擷取日期：2018 年 8 月 26 日。

Through Troubled Waters: Tracing the Armed Escort Servic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si-yuan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lthough a familiar feature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culture, appearing regularly in personal anecdotes, literary romances, and martial arts fiction,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s (*baobiao*) have largely eluded scholarly scrutiny. Drawing on a variety of offici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s. It shows that the Ming government used them to resist the Manchu invasion. The rise of armed escorts as a profession had a strong geographic link to Linqing Depart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served as a pivotal transportation hub on the Grand Canal. A growing demand for cloth from the South, among other goods, transformed Linqing into a prosperous trading center. For merchants who gathered there, protecting their goods and money was a pressing issue. The term for armed escorts (*baobiao*) reflects its origin in the Linqing cloth trade. *Bao* came from "to safeguard" the transportation of *biao*, the cotton piece goods. Hence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s emerged as a new vocation to protect the delivery of goods and provide security for their payment. The private security forces figured prominently when the Ming government faced the increasing Manchu threat from the northeast. Exploring the extant memorials of the late Ming, I have found that recruiting these escort forces in Linqing was proposed as a contingency plan to fight against the Manchus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Yet there is no evidence whether the plan was put into practice then. In the Chongzhen reign, however, the dynastic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plan. Approximately three thousand men from private security forces were enlisted into the imperial army.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annihilated by the Manchus in the final battle of the Chulai Mountain in Shando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s last days, when the fate of the state was at stake, it was once again

proposed that private security forces be incorporated into imperial military forces. However, the ragtag band of armed escorts was insufficient to turn the revolutionary tide and salvage the struggling dynasty from eventual collapse.

Keywords: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s, Linqing, Grand Canal, cotton piece goods, Chulai Mountain